

近年来中国高句丽研究述评

郭美英 王艳坤 祝立业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东北史地》杂志社, 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 2004年以来, 中国高句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表现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讨论, 形成了一些新的学术热点。其中政权归属、都城考证、文献考据、官制研究、早期历史探源及与中原王朝、周边民族、政权关系探究等研究内容都较以往有更进一步的讨论, 文章就近年来高句丽研究的有关情况, 从六个方面做综合述评。

关键词: 高句丽研究; 述评; 政权关系; 东北历史

中图分类号: K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2010)01-0146-06

2004年以来, 中国高句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该年年初《东北史地》杂志创刊(更确切的说法是《学问》杂志改刊为《东北史地》)之初即提出了以高句丽、渤海等东北史地内容为主要刊发对象, 这也使得这本杂志在之后很短的时间里成为高句丽研究领域内的一本核心意义上的期刊。截止到2009年5月, 《东北史地》累计刊发高句丽相关研究文章150余篇, 这些文章代表了近年来中国高句丽研究的最高水平, 也反映了中国高句丽研究的总体态势, 因而也成为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的主要样本。二是该年7月1日, 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贵族墓葬”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以此为节点, 中国的高句丽研究的内外环境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种变化对高句丽学术研究自身客观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这种变化和影响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但这同样构成本文选择以2004年为节点, 对近年来中国高句丽研究进行述评的一个原因。

总体上, 2004年以来的中国高句丽研究, 虽然面临诸多困难, 但仍然按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脉络, 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一些轨迹。

一、关于政权归属、边疆理论方面的讨论

高句丽归属问题一直是高句丽研究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 近百年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 中国学者发表了众多的相关文章, 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共识。进入本世纪, 张碧波的《关于历史上民族归属与疆域问题的再思考——兼评“一史两用”史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刘子敏的《走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误区——试析古人在高句丽归属问题上的错误说法》(《东疆学刊》2000年第1期)、孙进己的《当前研究高句丽归属的几个问题》(《东疆学刊》2001年第3期)、徐德源的《高句丽历史与疆域归属问题补议》(《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刘子敏的《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高福顺的《试论汉魏时期高句丽政权的统辖区域——以〈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事为中心》(《东疆学刊》2001年第4期)等论文的发表, 均使

作者简介: 郭美英,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杂志社副主编, 编审, 研究方向: 东北地方史; 王艳坤,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杂志社编辑, 副编审, 研究方向: 东北地方史; 祝立业,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杂志社编辑,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东北地方史。

归属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但正如徐德源先生在《高句丽历史与疆域归属问题补议》(《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所指出的:“诸如归属的标准问题,历史文献资料的选取,高句丽王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地位及其与历代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战争的性质,对隋唐诸帝的高句丽政策的评价,高句丽疆域与历史的继承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差别乃至在根本立场一致前提下的分歧,也还有认识不明确和论证不充分之处。”进入2004年,尤其是前半年,有关高句丽归属的研究在以往讨论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一个基本的特点是学者们的视角更加广泛,日益重视疆域理论的构建。著名边疆学家马大正先生在《中国学者高句丽归属研究评析》(《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一文中就曾指出:“当前,高句丽归属问题的研究,需要继续扩大视野,一是对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历史和活动地域的研究;二是开展中国古代疆域理论研究。在疆域理论的研究中,尤其应加强对宗藩关系和‘羁縻’政策等课题的研究。”其后,赵永春、刘炬在各自的文章《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内外迁徙及其归属问题》(《东北史地》2004年第3期)、《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性质的界定标准——兼谈高句丽政权的性质》(《东北史地》2004年第5期)中,从不同的切入角度,均试图构建一种普适性的标准。关于归属的标准,孙进己先生的《中国民族、政权、疆域研究》(《东北史地》2005年第1期)同样值得重视,在这篇文章中,孙进己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比如:“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是由中国历代皇朝的疆域所代表的”,“凡是今天中国疆域内各个民族的先人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及其疆域,不问当时是包括在中国皇朝的疆域之内,还是独立于中国皇朝之外,甚至是还归别国管辖,都是今天中国的历史疆域。今天中国的历史疆域应当包括今天中国各族先人建立政权的疆域,而不局限于历史上中国各皇朝的疆域,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这是过去许多先生都没有阐明的,这就是继承原则:只要今天中国各族占有了现今这块土地,就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这些土地上一切民族及其先人的历史文化包括他们的政权及疆域。这是一个国际通用的原则。”“确定历史上民族政权在当时归属只能依据当时归谁管辖,及管辖的程度及时间。”

在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方面,史长乐的《曾巩对高丽世次十问》(《东北史地》2006年第3期)、《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东北史地》2006年第6期)、《唐明宗披露了高丽太祖王建的族籍》(《东北史地》2007年第3期)。这3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直接谈高句丽的归属,而是分别剖析了朝鲜半岛历史上继统一新罗之后的政权王氏高丽为什么要刻意以“高丽”为国号的原因,同时也考证了高丽太祖王建的真正族籍,指出其与高句丽毫无族属、族源关系,揭示了造成认为王氏高丽与高句丽有继承关系的错误观点之历史来源。

二、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问题的讨论

高句丽早期历史问题包括民族起源、早期国家的形成,“五部”的分布等问题。近几年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讨论的首推王绵厚先生,本世纪以来,围绕高句丽起源与建国问题,王绵厚先后发表了《高夷·秽貊与高句丽——再论高句丽起源于辽东“高夷”即“二江”流域貊部说》(《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高句丽文化与中国东北秽貊系青铜组文化的渊源关系》(纪念韩国高丽大学建校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5年)、《西汉时期的高句丽“五部”与“第二玄菟郡”——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之三》(《东北史地》2005年第6期)、《辽东“貊系”青铜文化的重要遗迹及其向高句丽早期文化的传承演变——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之四》(《东北史地》2006年第6期)、《高句丽建国初期的“卒本扶余”与“涓奴”“桂娄”二部王族的兴衰递变——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之五》(《东北史地》2007年第5期)、《西汉时期的玄菟郡“帑沟娄”城与高句丽早期“南北二道”的形成——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之六》(《东北史地》2008年第5期)。以上文章简称高句丽早期问题六论。在这6篇文章中,王绵厚的核心观点包括:高句丽起源于辽东地区的“两江”、“两河”流域(两江指鸭绿江、浑江,两河指太子河、苏子河);高句丽的五部形成于前三代(朱蒙、琉璃明王、大武神王)时期;高句丽早期五部的构成,其主体

“涓奴部”和“桂娄部”应是辽东“两江”流域“卒本扶余”与“沸流部”（小水貊）和“大水貊”的联合体。高句丽早期五部的核心地区均在玄菟郡所属之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及周边地区。

对于高句丽早期问题，李大龙先生在《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2006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从五部名称的发展看，五部名称由血缘色彩较浓的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向地缘色彩突出的中部（黄部）、北部（后部）、东部（左部）、南部（前部）、西部（右部）的转化或可作为高句丽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在此后发表的《由解明之死看高句丽五部的形成与变迁——以桂娄部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第4期）一文中，李大龙指出：五族（五部）是构成高句丽政权的核心力量，高句丽疆域的扩大、对境内众多民族的征服和控制都是依靠五族的力量完成的，因而五族的分布范围也存在着一个变化过程，即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而变化，但最迟在唐代初期已经完成了由五族（血缘部落）到五部（地域部落）的变化过程。

此外，祝立业在《从“王国五部化”走向“五部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兼论高句丽王权与部权的消长》（《东北史地》2005年第5期）一文中谈到：高句丽的发展历程，表现为由“从王国五部化”到“五部一体化”的演进。正是在“五部一体化”的进程中，高句丽渐次封建化。高句丽灭亡前夕，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五部一体化进程完成，但最终被唐王朝的一统战争所打断。

杨军在《高句丽早期五部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院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中提出：高句丽五部中最早出现的是桂娄部（沸流部）、涓奴部（多勿部），琉璃明王迁都后，才在新都附近组建了其他三部，伊夷模在位期间高句丽的短暂分裂与五部间的矛盾冲突有关，结果是桂娄、涓奴两部被迁往国内地区，其地位也在下降。五部至少有14位大加，即部长，由他们组成的“诸加会议”是高句丽早期最高决策机构，特别是在外交、司法、祭祀与礼仪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五部集结于国内，演变为畿内和都城五部之后，高句丽王权得到加强，五部部长的权力受到削弱，其地位也逐渐降低。

关于高句丽早期问题，五部问题是核心，五部是如何形成、发展、演变的，五部的组织、管理模式、地域分布、民族构成、权力架构等问题都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的研究。

在高句丽的早期问题中，高句丽的民族起源也是一个热点问题，目前总体上已形成了五说：高夷说、秽貊说、夫余说、炎帝族系说、商人说。相信将来这个问题的讨论仍基本会框定在这一范围内。

三、新发现、新论、新考证

2004年以来，与高句丽有关的一批重要的遗迹遗物被发现或重新考证，使高句丽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拓展，并注入了新的内容。其中，张福有先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最后形成的文字成果统计，这些重要发现和考证主要包括：张福有的《集安禹山3319号墓卷云纹瓦当铭文识读》（《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集安禹山3319号墓卷云纹瓦当铭文考证与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好太王碑中的平壤城考实》（《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吉林集安出土瓦当及青铜铭文释读与考证》（《旅顺博物馆学苑》2007年12月）；张福有、孙仁杰、迟勇的《朱蒙所葬之“龙山”及太王陵铜铃“峻”字考》（《东北史地》2006年第1期）、《豆谷、豆谷离宫及琉璃明王陵》（《东北史地》2006年第2期）、《集安蒿子沟墓地调查与东川王陵考》（《东北史地》2006年第3期）、《高句丽王陵通考要报》（《东北史地》2007年第1期）；张福有、赵振华的《洛阳、西安出土北魏与高句丽人墓志及泉氏墓地》（《东北史地》2005年第6期）。对于上述新发现、新考论，张福有、孙仁杰、迟勇撰写了《五年间高句丽遗迹调查与文献研究中的新收获》一文，发表于《东北史地》2009年第2期，兹据此文摘要如下：文物遗迹调查方面的10项新发现是：（1）发现集安禹山JYM3319号墓边缘有文字的瓦当残件，第一次完整释读该墓瓦当的铭文。（2）在集安禹山0号墓发现绳纹瓦，确立了该墓的王陵地位。（3）在洛阳找到泉氏墓地，用考古证据证明高句丽贵族的流向和集安“五盔坟”不是泉氏贵族墓地。（4）在集安禹山墓区“五盔坟”等8座大型封土

墓发现瓦。(5)在集安麻线石庙子高句丽墓群旁边发现一个有高句丽瓦的石窟。(6)在集安良民一带发现 2700 多座古墓。(7)在集安蒿子沟发现一座高句丽王陵。(8)在三道沟发现一座古城。(9)在长白二十一道沟发现 13 座积坛。(10)在集安古道发现“乐善好施碑”和“同和岭修道碑”。文献方面共有 5 项新收获:(1)运用文献、地名和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考订“豆谷”是通沟。(2)晋高句骊率善陌长、仟长、邑长的印模现有 7 枚。(3)集安阳岔高台村出土赵国阳安君青铜短剑之阳安君为李跻。(4)释读好太王陵出土铜铃未识之字为“峻”字。(5)揭示好太王碑碑文中的“平壤城”是鸭绿江右岸由东向西按位置依次排列的一座城。

和上文提到的新发现、新考证相因应的文章有:李健才的《唐代泉氏家族墓地不在集安在洛阳令人信服》李殿福的《高句丽贵族有回葬旧茔之习俗集安五盔坟应为王陵》耿铁华的《高句丽泉氏墓地调查及其价值》孙仁杰的《从泉氏墓地看高句丽的回葬》梁志龙的《泉氏家族世系及其事略》(均见于《东北史地》2005 年第 4 期)。对上述的一些新结论也有一些质疑,如针对张福有的《高句丽第一个平壤城在集安良民即国之东北大镇——新城》(《东北史地》2004 年第 4 期)、《高句丽平壤东黄城考》(《东北史地》2004 年第 5 期)两文,刘子敏发表了《“新城”即“平壤”质疑——兼说黄城》一文(《东北史地》2008 年第 1 期)。此后,曹德全、肖景全的《从〈三国史记〉中的“新城”谈起》(《东北史地》2008 年第 3 期)、梁志龙、魏海波的《高尔山城始筑年代考辨》(《东北史地》2008 年第 3 期)又对刘子敏的部分观点进行了驳论。至此,文献中出现的高句丽“新城”问题成为学界的一个新的热点,相信将来还会有新的争论。

四、关于高句丽职爵、官制、政治组织模式的讨论

有关高句丽官职、爵位的讨论很早就构成了高句丽研究的内容,不少前辈学者都有过论述。进入 21 世纪后,这种研究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表现在对职爵的关注渐渐深入到官制研究,进而又开始探讨权力架构政治组织模式等问题。

在官制研究方面,杨军先生继 2001 年在《黑龙江民族研究丛刊》第 4 期发表了《高句丽中央官制研究》后,于 2005 年在《社会科学辑刊》第 6 期又发表了《高句丽地方官制研究》从而形成了他对高句丽官制的整体认识。在他看来,高句丽建国初期不存在正式的中央官制,是以五部官为中央官。五部的部长构成领主阶层,对王权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中央官的爵称即是高句丽五部部长的称号。自故国川王以后,随着高句丽王权的加强,五部的部长大权旁落,从地方官中选拔中央官渐成为主要途径,原地方官使者、先人的称号渐演变成为中央官称号。2 世纪中叶至 3 世纪末,高句丽逐渐形成自己的地方官系统。在五部控制区以外,高句丽共设六太守,太守下辖城宰,城宰管理城与城周围的村。5 世纪以后,在高句丽的地方官制中,城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最终形成大城辖小城的四级地方行政机构,其长官分别为:禰萨、处间、可逻达、娄肖,各相当于唐朝的三品、四品、五品、六品和七品官。但高句丽并不存在与中原类似的郡县制度及地方官制。

高福顺先生在高句丽官制研究方面也很有系统性,他在《高句丽官职中的“加”》(《东北史地》2004 年第 8 期)一文中认为:“加”字的官职出现于 3 世纪前后,出自夫余语,其义为各邑落的酋长或首领,在国家的军政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加”又分“相加”、“古雏加”、“大加”和“小加”。相加在高句丽官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百官之长。古雏加是高句丽大加官僚阶层中的特殊阶层,参与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势显要,地位尊贵。“大加”是高句丽五部中较大邑落的部族长或首领,是高句丽社会中较为高等的官僚贵族阶层;而“小加”指的则应该是比“大加”较低的官僚贵族阶层。其后他在《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的演变》(《史学集刊》2006 年第 5 期)一文中提出“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汉魏时期 7 级制、晋隋时期 12 级制、唐朝时期 17 级制等 3 种官位等级的变化,高句丽中央官位由五部贵族与非五部贵族两部分官员组成,他们所能担当的官位有严格的界限,并逐步形成了以兄为核心的兄系官位体系和以使者为核心的使者

系官位体系”。而后又在《高句丽官制中的兄与使者》(《北方文物》200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兄和使者是高句丽官制中常出现的两个官位。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兄和使者就存在于高句丽官制之中,并逐渐成为高句丽官制的核心官位。兄是高句丽王之宗族、五部中之贵族子弟所能担当的官位,使者是高句丽统治域内出身卑微、非王族及五部贵族子弟中的有才能者或立有军功者所能担当的官位。随着兄与使者这两种官位的发展,在2世纪前后,又逐渐分化出兄系官位群和使者系官位群,并形成兄系官位体系和使者系官位体系。”

在对高句丽官职、官制讨论的同时,也有些学者试图从权力架构出发构建高句丽政治制度史,这方面已发表的文章有祝立业的《从“王国五部化”走向“五部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兼论高句丽王权与部权的消长》(《东北史地》2005年第5期)、《以王权为中心的高句丽政治制度考察》(《东北史地》2007年第1期)、《从贵族交替执政到泉氏家族专柄国政——试论高句丽后期国内政治局面的形成》(《东北史地》2007年第6期),薛海波的《高句丽早期“那部”体制探析》(《东北史地》2007年第2期),刘炬的《高句丽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及成因》(《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

这一期间讨论高句丽职爵内容的文章还有:耿铁华的《晋封高句丽官印考略》(《东北史地》2005年第3期),鸿鹄的《高句丽国相制度研究》(《东北史地》2005年第6期),华阳的《浅析褥萨的产生》(《东北史地》2005年第6期)。其中耿铁华先生在《晋封高句丽官印考略》一文中,考证目前可见的7枚印文为“晋高句丽骠率善邑长”、“仟长”、“佰长”的晋封高句丽官印印模,应是西晋武帝时中央王朝封赐给高句丽地方官员的印鉴,这些印鉴证实了西晋王朝对高句丽社会统治管理深入基层组织的情况,同时也说明高句丽作为西晋王朝边郡封国的地位。在封国内,高句丽王实行五部和城邑制度的地方管理,表现了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管理的特点。

五、关于涉及高句丽内容的文献的讨论

2004年以来,对涉及高句丽内容文献的讨论成为一个研究特色,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李大龙、长春师范学院的姜维公、高福顺、姜维东、郑春颖等人的研究具有特色,这些研究涉及对史料的考订、整理、价值估定,史书辑佚、源流辨析等多个方面。以《东北史地》杂志为例,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李德山的《简论建国以来东北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东北史地》2004年第3期)、郑春颖的《浅谈正史〈高句丽传〉的设立》(《东北史地》2004年第12期)、姜维公、徐立勋的《从〈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看金富轼对海东三国纪年的安排——以高句丽建国时间为中心》(《东北史地》2005年第6期)、李大龙的《高句丽与东汉王朝战事杂考——以〈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为中心》(《东北史地》2007年第1期)、姜维公的《〈高丽记〉的发现、辑佚及考证》(《东北史地》2007年第5期)、李大龙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史料价值辨析——以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关系的记载为中心》(《东北史地》2008年第2期)、赵红梅的《略析〈汉书·王莽传〉中的高句丽纪事》(《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

关于《三国史记》的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姜维公、徐立勋注意到在中国早期的史籍中并无关于高句丽具体建国时间的记载,而撰写时间较晚的《三国史记》对海东三国却有着详细的纪年。鉴于《三国史记》的史源大部分来自中国史,少部分取自《海东古纪》而成书较晚的《海东古纪》也不可能具有相关纪年,因而《三国史记》中关于海东三国的纪年可能存在较大问题。带着这个疑问,姜、徐两位学者从《三国史记》卷1《新罗始祖赫居世本纪》关于新罗纪年的安排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三国史记》中的纪年是金富轼以中国典籍为依托,判断出海东三国大致的建国时间然后再主观安排后的结果。李大龙则通过《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内容与中国正史的相关记载的比对,认为:《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虽然大量引用了我国史书的记载,但是呈现前后两个不同的特点:本纪第一至第五与我国史书矛盾之处最多,遗漏也最多;本纪第六至第十的情况则是大量抄录以《资治通鉴》为主的我国史书记事。大量的抄录不仅导致这部分记载缺乏新的内容,而且有意地改动

或删除也造成了记事的不完整甚至为人们认识高句丽历史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一半以上字数的这部分内容史料价值是很低的。

郑春颖从正史《东夷传》的设立入手,探讨了十二家正史《高句丽传》设立的基本情况,对于了解古代正史编撰也有一定的意义。姜维公对《高丽记》的发现、辑佚过程,相关史料考证及历史价值评定也为我们认识和使用《高丽记》相关内容提供了参考。

六、关于高句丽同中原王朝、周边政权、民族关系的讨论

高句丽同中原王朝、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历来是高句丽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的领域。2004年以来,这种研究呈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就笔者目力所及,2004年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东北史地》就刊发了这方面的文章8篇,分别是:李德山的《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李淑英、耿铁华的《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姜维公的《南朝与北朝对高句丽政策的比较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孙玉良、孙文范的《高句丽向朝鲜半岛扩张始末》(《东北史地》2004年第1期),厉声、李芳的《隋唐征伐高句丽刍议》(《东北史地》2004年第2期),祝立业的《简论唐丽战争中的唐罗同盟与百济同盟问题》(《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姜维东的《论中原王朝对高句丽政策的思想基础》(《东北史地》2004年第5期),姜维东的《中原王朝对高句丽册封制度研究》(《东北史地》2004年第12期)。

2005年以来,在上述框架内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仅以《东北史地》杂志为例,包括:王臻的《高句丽同新罗百济的战和关系》(《东北史地》2005年第1期),史未央的《高句丽与百济新罗的争霸》(《东北史地》2005年第3期),刘炬的《论唐朝与新罗联盟关系》(《东北史地》2005年第2期),王成国的《略论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东北史地》2007年第1期),韩昇的《论南北朝对高句丽的册封》(《东北史地》2008年第6期),赵红梅的《玄菟郡经略高句丽》(《东北史地》2008年第5期)。此外,《社会科学战线》《东疆学刊》《北方文物》《北华大学学报》《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这一时期也刊发了数量不等的关于此主题的文章,此不详述。

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涉及了朝贡制度、治边政策、治边思想演变、战争性质评判等内容,这些内容也构成了高句丽同中原王朝、周边政权、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

小 结

以上列举的六个方面,只是笔者认为近年来讨论比较集中的专题,而这期间的高句丽研究绝不仅限于这六个方面。事实上,像都城、民俗、宗教、经济、军事、人口、墓葬、碑刻、人物、礼仪、族属、族源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这几年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只是限于篇幅和出于组织行文的考虑而无法详述。此外,限于作者的眼力及见识,许多重要文章或未曾述及,而述及到的文章又或理解偏颇,凡此种种,皆请读者见谅。另外,2004年至今,出版了许多高句丽研究方面的专著,此文无一提及的原因是囿于篇幅,容另文评述之。

责任编辑:尚永琪